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九辑)

总主编/李小明

北魏道士寇谦之

韩 府 / 著

北魏是山西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北魏道士寇谦之，也应是山西历史上一位挥洒过浓墨重彩的人物，尽管对他的评价可以有褒有贬。



25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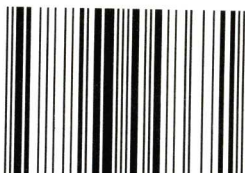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灵善
张建英
装帧设计 冀建海
插图 朱连威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九辑)

- ◎ 传说其人及其历史传说
- ◎ 晋献公与骊姬之乱
- ◎ 荀子与先秦学术的终结
- ◎ 北魏史话
- ◎ 北魏政治家崔浩
- ◎ 北魏道士寇谦之
- ◎ 鹳雀楼史话
- ◎ 山西汾酒史话
- ◎ 山西老陈醋史话
- ◎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山西

ISBN 7-203-04867-5



9 787203 048671 >

ISBN 7-203-04867-5

K·314 总定价:30.00元(全套10册)

Z12
2:

责 编:王灵善
 张建英
复 审:杜厚勤
终 审:张安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道士寇谦之/韩府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8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9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867-5

I.北... II.韩... III.寇谦之(365~448)-评
传 IV.B95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8779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9辑)

北魏道士寇谦之

韩 府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288千字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203-04867-5

K·31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申维辰

主 任 委 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目 录

一、家庭身世 (2)

二、仙山修炼 (4)

三、走近皇权 (11)

四、清理整顿 (16)

五、如日中天 (23)

六、日薄西山 (28)

七、历史地位 (34)

主 编 李元庆
副主编 马志超

引 子

在北魏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人物，雄才大略、眼空四海的太武帝拓跋焘对他可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朝中位极人臣且博古通今的崔浩本来是恃才傲物、目无余子，然而对他却也是毕恭毕敬、奉若神明，两人在一起时经常谈古论今、交流思想，其亲密程度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寇谦之。

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中，寇谦之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人物，对于道教的壮大和发展功不可没，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实为道教复兴之功臣”。具体说来，他撰著经书、制订仪规，并以极为有效的手段争取到国君和重臣的支持，使得天师道一跃跨上国教的宝座，而他本人也随之成为位尊爵显的天师、国师。就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而言，此人的影响和作用也非同小可，在他撰著的经书中，一方面吸收、模仿佛教的戒律，一方面借鉴、融合儒家的理论和学说，使其理论体系既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又不乏地道的中国儒家文化色彩，可谓是开启了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先河。此外，道教信徒对他敬若神明，说他的符章百灵百验，而书画艺术家、艺术史家却又极力称赞他为造诣非凡的书法家，夸他的书法出神入化，巧夺天工。

一、家庭身世

寇谦之生活在公元 365 年到 448 年之间,如果准确地把 他放在中国历史的坐标系中来说,就是生于前秦建元元年,卒于北魏太平真君九年,享年 83 岁。寇谦之的名字或说是单字“谦”,或说是双字“谦之”,以至有的学者说他“原名谦,后改名谦之”。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经过研究大量类似的例证,指出:实际上,称单字和双字都是一样的,因为在六朝时期,许多天师道信徒姓名上的“之”字只起表示宗教信仰的作用,使用中是可以省略的,这情形大约和佛教徒名字中的“释”字有相仿之处。就是说,称他寇谦之和寇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寇谦之的表字是辅真,这也很值得玩味:“辅”字不用说,那是要辅佐君主的意思;那个“真”字的含义就相对复杂,首先它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因为道教是十分崇尚所谓“真”的,要求信徒们能够“返本归真”,而得道之士也被称作“真人”,同时,这个“真”字又似暗指北魏至高无上的皇帝,即所谓“太平真君”拓跋焘。“辅真”即表示他要忠心耿耿地辅佐“太平真君”。

寇谦之的祖籍是上谷昌平,其位置在今北京市辖区之内,后来迁徙到冯翊万年,即今天陕西省的临潼北部一带。关于迁徙的原因,史书记载不尽相同,或说“因官”,或说“困难”。实际上,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两种说法大约都是托辞,不足为信。其真实的情形很可能是:在三国时期曹操将汉中数万户张鲁信徒迁徙到长安及三辅地区,

寇氏家族也是其中的成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关于寇谦之生平上的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不但迎刃而解,而且所有的解释也无不怡然理顺了。这就是说,寇谦之出生于一个世代信仰五斗米道的家庭里,他生来就是五斗米道的一颗种子。

关于寇谦之的祖上,据说能够追溯到的最早的是后汉的寇恂,寇谦之自称是寇恂的第十三世孙。寇恂是东汉时被明帝刘庄高高供在云台之上有名有像的二十八将之一。据史书记载,此人一生中征讨贼寇、创办学校,文治武功并重,因而在当时既得民心,又得君心,所以才能得到“图形云台”的殊荣。

寇谦之的父亲是寇修之,字延期,曾在苻坚手下任东莱太守。寇谦之的兄长名叫寇赞,字奉国,在北魏初任南雍州刺史,负责招抚秦雍之流民,《魏书》在列传三十中为之立传,可见他绝非等闲人物。

正因为寇氏家族世代信仰道教,所以寇谦之自然而然从小也就是天师道的信徒。至晚在十八岁上,寇谦之就倾心慕道,具有了超尘绝俗之心,立志要修道成仙。此时他所修习的正是家传的张鲁一派的道术,走的是丹药的路子,“服食饵药”,以期延年益寿,幻想白日飞升。寇谦之青壮年时代修道求仙,主要活动于后秦羌族姚氏政权(384~417)控制的关中与河南嵩洛地区。但是,寇谦之修道茹丹的结果很不理想,落了个“历年无效”。但寇谦之仍不死心,继续摩顶放踵,苦心修炼。后来,遇到了影响了他一生的决定性人物——成公兴。

二、仙山修炼

寇谦之是在姨妈家中巧遇成公兴的，当时成公兴的身份是一个干粗活的苦力。这位“仙人”成公兴和其他神仙人物一样，身世诡谲神秘，人们始终不知他是何许人也，更不知他是怎样到了寇谦之的姨妈家做佣工的。

那一天，寇谦之去看望他的姨妈，不经意发现在姨妈家干活的那个男子长得五大三粗，十分强健，而且干起活来似乎永远都不知道疲倦。不知是由于他的外貌太强悍，还是对他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感兴趣，寇谦之离开的时候，向姨妈请求要把这个人带回去给自己干活，姨妈同意了。

带回住处后，寇谦之便让这个大汉开垦荒地，而一心慕道的谦之本人却还在孜孜不倦地用心研究道术，他带着有关用具坐在一棵树下聚精会神地做着有关天文的算学运算。没想到，这位成公兴一方面努力开垦劳作，另一方面却兴致勃勃三番五次地跑来看寇谦之运算。寇谦之对他的举动觉得有些奇怪和不解，甚至还有几分反感，忍不住对他说：“你好好地干你的活就是了，老看我干什么？”显然这是批评他操闲心，不务正业。谁知这个成公兴还是屡教不改，第二天、第三天仍然不断跑来观看。而这时恰好寇谦之算到有关“七曜”的题目，这部分问题实在太难了，寇谦之绞尽脑汁也始终没有搞出个所以然来，不禁一个人呆呆地傻坐在那儿，一副惘然自失的样子。更让人万没想到的是，这时候那位在一旁站立多时的成公兴却开口了，他问寇谦之：

“先生，你为什么好像不太高兴？是碰到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了？”寇谦之便向他解释道：“我研究算学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但是最近搞到《周髀》这一部分，算出的答案总是不对。所以，自己觉得真是惭愧得很。”他把自己的难处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了成公兴，说过之后寇谦之不免有些后悔，他想，我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告诉这个干粗活的笨苦力又有什么用呢，心里这么想着，嘴上不由自主地就说出来：“咳，这也不是你能弄清的问题，你问这干啥！”没想到这个成公兴却提出让寇谦之按他的方法试一试：“先生，您不妨按我所说的重新试作一次，看看结果如何。”此时的寇谦之可说是得病乱投医，竟然真的按着他的说法重新试算。这一试不要紧，哪料想寇谦之苦思冥想多日而不得的结果当即就出来了。寇谦之大吃一惊，不禁对眼前的这个粗汉刮目相看起来。他这时才觉得这个成公兴不是一般人物，感觉此人深浅难测，当即心悦诚服、肃然起敬，表示要拜成公兴为师。而成公兴却又是固辞不肯，反而提出要给寇谦之做弟子。寇谦之拗不过他，最终不得不答应了。

这时，成公兴看出寇谦之对自己是一片诚意，于是就向他讲出了真心话。他对寇谦之说：“先生，您要是真心有意学道，那最好是跟我一起隐遁几年，不知您愿意不愿意？”听到这话，一心要得道成仙的寇谦之自然是欣喜若狂，他当即表示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身为弟子的成公兴又以师父的口吻让寇谦之洁斋三日，之后，师徒二人共入华山。成公兴又安排寇谦之住到一间石室里，而他自己天天外出采药，采回的药材经过加工后让寇谦之服用。据说寇谦之

服用以后竟然再也没有饥饿的感觉。这就是道家所谓的“服饵”。

再之后，成公兴又带着寇谦之迁移到另一座名山——中岳嵩山之上。到了山中，成公兴领着寇谦之来到一套三重石室，他让寇谦之住在第二重石室中。就这样过了一年以后，有一天成公兴忽然告诉寇谦之：“今天我外出后，肯定有人会带一些药物来。你什么都不要考虑，只管把药吃了就是，千万不要疑神疑鬼的。”说罢，成公兴就悄然而去。不久，果然有人带来了一大堆药物，但等寇谦之打开看时，不禁毛骨悚然，原来这次所谓的药物不再是华山上成公兴所采制的草木药物，而是些蝎子、蜈蚣、毒蛇、蟾蜍之类让人恶心得不得了的又臭又脏又有毒性的东西。寇谦之惊惧万分，不禁吓得仓慌逃窜。成公兴回来后，向寇谦之询问了情况，寇谦之不敢隐瞒，一一如实做了回答。成公兴听罢，不禁仰天叹息道：“咳，可惜先生已经不能够成仙升天了，只能在人间做个帝王师罢了。”这句谶语式的话，给寇谦之的前途甚至一生的命运下了一个结论性的预言。这是道教徒惯用的蒙人手段。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成公兴突然安排起自己的后事来。他对寇谦之说：“我不能够再呆下去了，明天中午的时候我就得离开。我死之后，还有劳先生给我沐浴一番，再以后的事就不必您管了，自然会有人来接我走的。”说完之后，成公兴就独自进入第三重石室之内。等寇谦之也跟随进去看时，成公兴已经仙逝。寇谦之这次不敢再不听成公兴的话，便按着他的安排亲自为他沐浴。第二天正当

午时，果然有人来叩石室的门了，寇谦之到门外一看，来的是两位仙风道骨的童子，一位双手奉持法服，一位手持钵盂和锡杖。寇谦之便把两位童子引入石室，等到了成公兴停尸之处，没想到刚才还僵硬的尸体突然“呼”地一声动起来了，成公兴像复活了一样，他动手穿戴好童子带来的法服，一手托着钵盂，一手执着锡杖，凌空飞升，飘然而去。这就是道家所编造的“白日飞升”的神话。

《释老志》的上述记载，显然不免有夸诞虚构的成分，而且这些内容很可能出于寇谦之本人的杜撰，不可信以为真。

嵩山、华山自古就是北方名山，东汉、魏晋以来不断有方士入山修道，这是事实。比如前秦道士王嘉在淝水之战后也曾移居嵩岳，这是有据可考的。另外，据《魏书·殷绍传》载，后秦时河南伊川一带确有一位来自胶东的方士成公兴，号称“游遁大儒”，此人精通历算，殷绍曾跟随他学习过九章算术方面的学问。此人应当就是寇谦之所遇到的仙人成公兴。剥去寇谦之编造的神秘面纱，知道寇谦之并非生而知之，他青年时期曾随方士修习神仙之方术，应属事实。那么，寇谦之究竟跟他名义上的“徒弟”实际上的“师父”成公兴学习了些什么呢？经过考证可以知道，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医学，二佛学，三天文算学。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却又历年无效的事实，正说明他原来所学习和掌握的张鲁“五斗米道”那一套医学知识是十分落后的，而后世直到宋代民间仍然盛传寇谦之治病祛邪的道术相当灵验（素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签》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这不正说明

他后来又学习和接受了更为先进的医学知识了吗？我们再看成公兴，他本人貌甚强健，干活又能像永动机似地力作不倦，不正说明他身体健康吗？而他给寇谦之采来的药物有强体止饥的神效，不正说明他深通医药学吗？另外，我们从成公兴的另外一名弟子殷绍的求学经历，也大致可以推知寇谦之的学习过程和内容。成公兴给殷绍介绍的两位师父是佛门高僧，他们教授他的课程中竟然有解剖学等医学方面的内容，即史书上所谓“演隐审五脏六腑，心髓血脉”，可见其医学造诣之深。其次，前面提到寇谦之虽学算累年却在演算“周髀”时长时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而在成公兴指导之下，他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需要的结果，这不正说明成公兴的天文算学知识远在寇谦之之上吗？这背后隐藏的一个事实是：寇谦之原来从五斗米道所接受的旧的算学——旧“盖天说”——不够精密和高明，而成公兴及其佛门朋友掌握了印度新传入中国的天文算学知识——新“盖天说”。此外，寇谦之在这一时期一定还学习了佛教的某些经典，尤其是律学方面的知识，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成公兴虽已“神奇”，但在道教谱系中，没有什么地位，于是寇谦之进一步编造他的“得道”神话。

据说在成公兴离世后，寇谦之一个人“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他的这种意志和精神再次感动上苍。神瑞二年十月乙卯这一天，忽然有一大群神仙浩浩荡荡从天而降，他们乘龙驾云，后面跟随着青鸾、凤凰之类的珍禽异兽，几位仙人玉女左拥右簇，众星捧月般地侍卫着一位天神——道教

鼻祖太上老君。这群仙人慢慢降落在山顶之上，随后，太上老君对寇谦之说道：“四年之前，嵩岳的山神镇灵集宫主上表天曹，汇报说：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凡间修道之人，苦于没有师父指导传授。嵩岳之上有位上谷道士寇谦之，此人立身直理，行合自然，他的才能和德行都堪当师位。正因为得到他的这一报告，所以，我这才亲自来看望考察你来了。现在，我要授予你天师之位，并且赐给你一部篇幅长达二十卷的经典——《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此经的正名也叫《并进》。”之后，老君又专门就这部新经作了解释和说明：“我传授你的这部经戒，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不曾在世界上流传，今天时机成熟，它才应运数而出。此后，你要认真宣扬我赐给你的这部《新科》，做好清整道教的工作，除去三张伪法，尤其是所谓的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术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道教追求的是清静无为，所谓大道清虚，岂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之后，又对以后的道教发展方向也做了指示，告诫寇谦之应当“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就是说，儒家的“礼度”应当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一些修炼的方术。之后，又令随他而来的十二位仙人具体向寇谦之传授了服气导引的方法和口诀。寇谦之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辟谷”之法，当即就觉得气盛体轻、精神焕发，而且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一次，寇谦之把自己的道统直接老君，而且还借老君之口，宣布自己的“清整道教”主张。

后来，寇谦之也自知“直接老君”，太过虚狂。就又编造了老君玄孙李谱文授命于他的神话：

说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十月戊戌这天，又一位仙人

牧土上师李谱文光临嵩岳。此人据说是太上老君的玄孙，昔日曾在代郡桑乾河附近定居，还早在汉武帝的时代就已得道成仙。他的现任职务是“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之政，所管辖的范围为方圆十八万里。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处。见到寇谦之后，这位来头不小的牧土上师自称是仙界派遣来的，要把嵩岳所统管的方圆万里大小的一块地盘交给寇谦之统领管理。牧土上师还向寇谦之做了如下诰示：“我在天宫之中，敷演真法。现在给你定下二十二年的道龄，这其中除去有十年为学习和启蒙阶段，剩下的十二年中，虽然你教化没有太大的功绩，但却有四处传道的百授之劳。今天我还要赐给你升迁天宫中的四个职位，即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如果你今后还能勤奋修炼，坚持不懈，我们还会根据你的表现和贡献再次提升你。另外，我还要赐给你‘天中三真太文录’，有了它，你就能指挥和奖惩世间众神，并有权教授徒弟。这个‘文录’一共分为五等，第一等是阴阳太官，第二等是正府真官，第三等是正房真官，第四等是宿宫散官，第五等是并进录主。五等职位不同，在做法时的坛位上，礼拜时的仪式上，以及衣冠服饰方面，均各有区别和差异。这部真经总共六十余卷，其正号为《录图真经》。现在赐给你掌握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世。如果能兴造成功‘天宫静轮之法’，那你就会登超上界，成为真仙了。”之后，上师话题一转，又谈到了有关教民之事，他告诉寇谦之：“人间的末劫就要降临，所以传教事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但是，所有教民，无论男女，只要能坚持设立坛宇，朝夕礼拜，对神明恭

敬，神明就会像对待家中的父亲一样对待他。而且，他的这种功德，还可以泽及上一辈。信徒之中凡能修身练药，学长生之术的，最终都可以成为‘真君种民’，就是说虽历经劫难而无恙，相反会在下一劫在中成为最初的人类的始祖。”这位上师莅临凡界，向寇谦之下达了委任状，宣布他所统领的教区的范围，使寇谦之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收授信徒、辅佐君王。寇谦之正是通过这种手法来确立在道统中的地位。

三、走近皇权

公元424年，北魏新一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改元始光。

寇谦之审时度势，纵览全局，觉得时机已然成熟，便满怀热望地捧着他的宝贝下山前来拜见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寇谦之带着一些弟子长途跋涉，由中原来到塞上平城，他的借口是要进献“天书”。寇谦之为什么一定要把“天书”献给太武帝，而不是旁的什么人呢？剥去“天命神授”之类的外衣，就不难知道，在确立“人主”这一问题上，寇谦之也是下了一番选择的功夫的。首先，寇谦之青壮年时，统治着关中、嵩洛一带的后秦政权，自姚兴奉迎鸠摩罗什入关后，一直大力提倡佛教，而对道教似乎不感兴趣。公元416年姚兴死后，东晋刘裕大举北伐，很快灭掉后秦，并在此后数年中一直控制着嵩洛地区。而刘裕本人是靠镇压南方五斗米道孙恩、卢循起义发家的新军阀，历来对道教无奖掖之举，因而，他也绝对不是适合寇谦之投靠的对象。推测起

来，寇谦之大概一定考虑过刘裕这个人选。为什么呢？因为刘裕手下有一位大臣名叫毛修之的，此人北魏泰常年间曾任河南河内太守，镇守嵩洛一带，大概在此期间，他曾礼拜于寇谦之门下，敬事过寇谦之。但是，最终寇谦之也并未因这一层关系投靠南朝刘宋政权。分析起来，这其中原因有三：其一，纵观大局，唯北魏政权似乎前途远大，可成大业，靠着这棵大树，寇谦之及其天师道才可能有大的作为；其二，北魏历代皇帝多有信道服饵的传统，比如《释老志》就记载着太祖拓跋珪“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他的接班人太宗即位后，也步太祖后尘，“亦好黄老”。另外还有下面将要详细谈到的设立仙人博士、建置仙坊、煮炼仙丹等一系列崇道举措。因此，寇谦之找这些人传道，势如顺水行舟；其三，寇谦之选择北魏政权为依附，或许与其兄长寇赞不无关系。姚秦灭亡后，寇谦之兄长寇赞投奔代北的拓跋魏政权，被重用为北魏南雍州刺史。家庭的影响可能促成了寇谦之挑选拓跋氏统治者来实现他“为帝王师”的愿望。

但是，事实却有些出乎寇谦之的预料。把全部精力和心思都投放在扩大疆土、壮大实力上面的少年皇帝拓跋焘，开始对寇谦之的这些宝贝不是十分感兴趣，这从对他的接待和安置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世祖太武帝让寇谦之一行人住在昔日张曜炼丹时所造的一所房子里。张曜是个什么人呢？这还得从太祖道武帝说起。太祖喜好老子之言，对《道德经》诵咏不倦。天兴年间，仪曹郎董谧献上《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获准设置仙人博士一职，并设立“仙坊”，煮炼百药，另外又把西山封给他们专用，炼丹煮药所需要的

燃料就由那里解决。等丹药炼出来后,让犯死罪的重犯尝试服用,结果死囚们服用后大多一命呜呼了。但是,君臣双方都并不因此死心,认为服食丹药和别的事情不一样,需要有诚心,死囚们所以服丹而亡,未必一定说明是丹药不灵验,倒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服食丹药不是出于他们的本心,所以,很难判断是否有效。因此,按着太祖的意思,这件事仍将继续做下去。这时候,一位名叫周澹的太医嫌采摘煎制太过辛苦、麻烦,就打算设法废止此事。于是,他让他妻子买通仙人博士张曜的一名小妾,从她那里打听到张曜的一项不为人知的罪行,之后进行举报。张曜不愿接受死刑,便向太祖请示自己去试修“辟谷”之法。太祖准许了,就让手下人的鹿野苑中为他造了一座静堂,按时供给他日常费用,并拨给他二户人家为洒扫仆役。因而,炼制丹药的工作实际上没有停止。又过了很长时间,太祖的兴趣也渐渐减退,再后来,终于把这件事停了下来。现在,让寇谦之住在一个因先皇已经没有兴趣而遭到冷遇的术士的旧居,太武帝对他的态度可想而知。

再说,历来的人情都是上行下效,草随风偃,皇帝的态度是这样,其他的大臣也差不远,对于寇谦之的这一套玄妙奇异的神话、仙话说教,朝野上下,都是半信半疑,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相信。总之,寇谦之没有像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得到重用和礼敬。然而,寇谦之重振道教、辅佐君王的宏伟计划也并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令其欣慰的是,地位显赫、在朝中具有左右帝王之力的重臣崔浩对寇谦之和他的“天书”、法术的看法与众不同,并且要拜寇谦之为师,率先

屈尊接受他的法术。

在寇谦之欲进无门的关键时刻，位极人臣的崔浩竟然俯就寇谦之，甘心为他的弟子。这着实是寇谦之求之不得的。崔浩是他看见的惟一曙光，自然他对崔浩是亲近有加，希望藉此附势以进；而崔浩也正需要拉拢寇谦之，借重其道术重新出山——这时的崔浩正受到皇家的冷落。他二人一个是迷信方术的儒家官僚，一个是“专以礼度为首”的道教教主，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宗教仰，使他俩一拍即合。寇谦之更为幸运的是，崔浩还不仅仅是停留在本人相信的地步，他还要说服太武帝，让他也相信。他郑重其事上了一道奏疏，引经据典地“赞明其事”，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为寇氏及其新法鼓吹。崔浩在奏文中写道：

我听说历代圣王承受天命时，上天无不显示某种预兆。但是，所谓的《河图》也罢，《洛书》也罢，都不过是寄言于某种动物的花纹。从来没有像寇谦之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天神亲自与人相见、当面传授，神仙赐下的经书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这真可说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当年汉高祖可以说英伟圣明了吧，可是商山四皓尚且觉得如果屈为臣下，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因而不愿为之屈节出仕。可是现在我们的情况却要好得多，像寇谦之这样本来隐居在山中的清德隐仙，竟然不召而至，这实在是陛下您能够继承您的老祖宗黄帝伟业的一个上天符瑞呀，您怎么可以因为听信一些毫无见识的世俗常谈，而马马虎虎地对待上苍的灵命呢。这一点，臣下我可是十分害怕而又紧张呀。

这个崔浩真不愧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他的这

番话说得也的确十分有水平，其中既有奉承、恭维，也有劝导、诱惑，还暗有几分威胁，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触到了世祖太武帝的痒处——得到上天的符命，名正言顺地统一天下。原来，拓跋氏虽源出朔外，却自认为是黄帝之后，这当然是意图证明自己具有为中原之主的资格，统治全国，故而《北史·魏本纪》说：北魏拓跋氏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黄帝有一个儿子叫昌意，昌意的儿子受封于北国，其位置就在大鲜卑山，所以，他的后人就称为鲜卑。崔浩的上疏紧紧抓住太武帝正欲“侔踪轩黄”、入主中原的心理，着力宣扬《录图真经》中的符命之说。应当看到，北魏政权是在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基础上建立的，按当时一般汉人的观念来看，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鲜卑族统治汉民族，是所谓“征服王朝”，用中国儒教传统的政治尺度来衡量，北魏皇帝并不是上应天命的正统天子，没有资格统治汉民族。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此，太武帝急切渴望能通过某种方式，取代儒教天命，得到能受到汉人承认的“名份”，而眼下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天命”。为了得到天下，太武帝最好能得到“天命”；为了得到“天命”，他最好是顺水推舟地接纳道教。于是，寇谦之终于赢得了当朝皇帝的器重。其实，深一层来看，不仅太武帝这次接纳天师道的根本原因在此，其后来亲自接受道教的符箓、受封为“太平真君”，也是出于同一动机和目的。经过崔浩的解释和游说，太武帝果然对寇谦之刮目相看，待为上宾。所以，太武帝不觉欣欣然，当即表示对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深信不疑，并下诏派遣使者携带玉帛牲牢，祭拜嵩岳，并且把寇

谦之留守的其余弟子全部接下山来。

四、清理整顿

由上可见,天师道进行清理整顿,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事情。就寇谦之而言,这既是一种动力,又是一种压力。再进一步分析,从来源上说,这种动力和压力主要又不外乎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社会舆论。这关系到道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威望等。第二个方面是佛教的攻击。这关系到道教与佛教的斗争,最终将影响到道教自身存在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是自身的缺陷。别的且不说,光是体系不够健全、缺乏必要的理论这一点,就是天师道的致命弱点,因为它不足以长期维持人们的信仰。第四个方面是靠近政治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道教要想生存、发展、壮大的话,最佳选择同时也是必由之路就是借助政治势力,或者说取得统治阶级的支持。归纳起来看,前二者要求除弊,后二者要求改革;前二者要求吐故,后二者要求纳新。总而言之,立即并且大力改革天师道,既使当朝统治阶级的要求,也是道教内部广大教民和有识之士的要求。

其实,看到改革必要性和迫切性的不只是寇谦之一人,在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代,无论在南方或北方,道教内部都曾出现过由门阀士族信徒发起的改革运动,在寇谦之之前有葛洪,在寇谦之后又有南方的陆修静,再晚些还有“山中宰相”陶弘景。这些人先后对天师道进行的清理改革,逐

渐使汉末原始民间道教演变为比较完备成熟的、官方化的正统宗教。在这里要说的是，众多门阀士族信徒对天师道起而改之，充分说明清理整顿天师道在当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不难理解，寇谦之整顿改革道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名份和权力。他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地实施他的改革计划呢？寇谦之捧出了高至无上的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如《释老志》中所叙述的那样，寇谦之宣称清理整顿道教的权力是上界的太上老君赋予他的。据说，太上老君将经书交给寇谦之时即声称：“我的这部‘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不曾流传于世，现在时机到了，所以应运而生。”太上老君交代寇谦之应做的具体工作是：“宣传我的这部《新科》诫经，清理整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这也就是寇谦之“清理道教”的主要内容。而老君对这些弊端否定的理论根据是“大道清虚”四个字，并且对以后道教的发展方向也做了指示，告诫寇谦之应当“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就是说，“礼度”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一些修炼的方术。这是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总纲和总目标。

由此而来，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的基本依据和方法，同时也是总的原则和总的思路必然是：以释为鉴、援儒入道。为什么要“以释为鉴”呢？因为佛教经过印中两国数百年几十代高明大德的刮垢磨光，在教义教理上更加成熟完善，各种制度也更加健全，因而，可为道教的样板和模式。又为什么要“援儒入道”呢？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以为：两晋时代的天师道信徒属于士大夫附级的固然不少，但其中大多

数都是庶民百姓，因而，士族儒家的礼法，自然不可能见于当时的天师道中。相反，天师道中所见到的是租米钱税等贪财的经济行为以及男女合气等淫秽浊乱之术，而这些恶浊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成了反对道教的人们的借口。寇谦之生活的时代正值江左孙恩、卢循政治运动失败以后，天师道的上述非礼无法的表现，尤为当时的士夫所诟病，所以，“清整”天师道已成了道教本身的一个要求。这就是说，以释为鉴，可以使天师道更像一个成熟的宗教——更宗教化，而“兼修儒教”、“以礼度为首”，便可以使天师道更像一个地道的中国宗教——更中国化。

在这样的原则和思路指导下，寇谦之对天师道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政治上要与当朝统治阶级站在一起，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坚决制止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的行为。两晋以来，在全国许多地区发生过无数次以李弘、刘举名义领导的道教徒起义。寇谦之对此非常仇视，甚至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他认为从世间法来说，这是大逆不道；从出世法来说，是对太上老君的极大亵渎。因此，他要求天师道应当是实行父慈、子孝、臣忠等道德原则的天师道。寇谦之要与当朝统治阶级站在一起，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公开打出“佐国扶命”的大旗，大张旗鼓地向当朝统治阶级献媚。仅《老子音诵诫经》中就两次出现“佐国扶命”的字眼，前一次是说张陵，后一次是明显地将这一重任同时也是殊荣落到寇谦之自己的头上。正因为在一切犯上作乱的行为中最使寇谦之不能容忍的是下层道民利用道教组织，

以李弘(老君化名)、刘举名义发动起义的事情,所以他在所谓的《太上老君音诵诫经》中,借老君之口,大骂假道教之名行造反之实者,说他们是“称鬼神语”,“惑乱愚民”,并且明确表态:“我怎么可能化身转世于这此下俗臭肉、奴狗魍魉之辈中间,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呢!”这种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的话,在统治阶级听来自然是十分悦耳动听的。

第二,在经济上要求神职人员廉洁自律,减轻教民们的负担。具体的措施主要是废除三张时期的租米钱税制度。原来,早在张鲁统治汉中的时候就曾实行过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在所辖区域内“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租米钱税,统由祭酒(天师道各级首领)征收和处理,这样在各教区内就形成了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可以独立的王国。这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寇谦之斥之为“伪法”,主张必须按“新科”加以革除。改革经济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减轻教民及信徒的经济负担。“新科”规定:如果教民有了病,只需要准备一些香火,虔诚地上奏章表,即可得到“感彻”;经济上的要求是一年上贡纸三十张、笔一支、墨一方就足够了。显然,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新科”,极大地减轻了道民的经济负担,这样做对于扩大宗教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这种改革也是赢得人心、改变形象、吸引宗教信徒、扩大宗教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三,在组织上大力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科律仪范。如前所述,自张鲁下世以后,天师道虽然在范围上向全

国扩展,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应有的管理,致使组织涣散,科律废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五斗米道的祭酒之官流行的是“父死子系”的“世袭”式的传承制度。不难想像,这种制度下任命的神职人员,其人品道德、教理素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更甚者目不识丁、顽冥浑沌之徒亦都可得到“祭酒”之职,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使道益荒浊”。针对这一点,寇谦之提出改革道官、祭酒父死子嗣的陈规旧制,实行“简贤授明”的办法,选贤任能,择优录用。在他托伪而作的《老君音诵诫经》中说:用官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简贤授明,惟贤是授。如果“道官们的子孙清彻聪明,闲练鬼事”,那么就可以受署符箓诫律,继承其父亲的职位,继续他的工作;相反,如果道官的子孙不肖,“用行颠倒”,行为上不能自觉地把自已与一般俗人相区别,不遵守道教内部的科约仪轨,则应当经过评议后,将鉴定的结果“表奏天曹,听民更受”。总的来说,废除“子承父业”这种世袭制度,就可以从组织上保证专业人员队伍的质量。

第四,在制度上增订戒律和斋仪。增订戒律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如忠、孝、仁、义等;其次是对佛教戒律的借鉴,除了“五戒”、“道德尊经戒”、“道德尊经想尔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等一大堆显然是佛教戒律翻版的戒律外,其它经文中也大量出现佛教的一些名相,如“大乘”、“福田”、“法轮”、“天堂”、“金刚”、“地狱”、“五苦”等等。同时,寇谦之也认识到了某些宗教仪式、活动规范的重要性,对斋醮仪范也十分重视。为此,他对道教斋仪作了许多增订。

关于养生和修炼，寇谦之认为单单只修炼服饵、辟谷、导引等方术，只能寿终，不能长生。要得长生，必须专心礼拜求度为主，“辅之以练气服食”，此外还需按时焚香礼拜，即所谓“建功香火”，这样才能“斋练功成”。他在《老君音诵诫经》里说：“打算修道长生的人们，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持诵经诫，建功香火，斋练功成，感彻之后，便可达到长生的目的。”换句话说，要想长生久视和得道成仙，不能单纯强调吐纳交接之术和服食丹药，更重要的是通过诵经、礼拜和修积功德，从中领悟到长生的秘诀。这种主张，实际扬弃了葛洪金丹派道教服丹成仙之说，把道教的虔诚提高到“心识”的阶段，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于道教修炼的方术，寇谦之反对滥传房中术，也反对滥传服食仙方，而特别强调要以斋功为养生求仙之本。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修炼房中术的“身中至要，导引之诀”，全部由师父掌握着，他如果不说出来，信徒仅靠通晓黄赤经文、佩带符契是不够的。修行者必须“一心香自纓，精炼功成，感悟真神与仙人交游”，才能得到真诀。所以“诫经”要求信徒们要在斋功方面多努力，以返为始，洗刷自己犯下的罪孽和错误，这样才能感悟真仙。做到了这一步，仙道就不远了。修炼服食养生之术也是这样。寇谦之认为服食药物只能保证除病寿终，而要想长生，关键在于奉守道诫，斋功礼拜，感通仙官下降接引，口授诀要，才能飞升成仙。他告诫打算通过修炼获得长生的人，只要好好学习诵读《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同时“建功香火”，这样斋练功成，感彻之后，即可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对于所谓“男女合气之术”，寇谦之的态度基本上是对立的。他曾明确表态：“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不过，寇谦之并不主张完全废弃房中之术，只是反对滥传而已。

关于所谓厨会，寇谦之的态度似乎也与对待房中术相似。他并不反对举办厨会，而只是反对无组织、无规范地滥设厨会。所谓“厨会”其实就是聚餐一顿，当然，也要举行宗教仪式。关于厨会的具体仪式，寇谦之的“诫经”中也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厨会共分三等，上斋是七日，中斋是三日，下斋先宿一日。同时，要求到会者要态度端正，严肃认真，绝不可嘻戏笑闹、嗔恚无常。

以上只有代表性地重点介绍了寇谦之关于长生和厨会方面的一些改革内容。实际上，在现存的《老子音诵诫经》中关于斋醮礼仪的具体内容还很多，如奉道授戒之仪、求愿收福之仪、攘灾除病仪、忏过解罪仪、三会之仪等等。这些仪式有些是五斗米道原有的，寇谦之对其做了新的详细规定。这样一来，使新天师道神职人员有规定可循，有章可据，同时也使新天师道的宗教气息更加浓厚。

第五，在教义上大量吸收儒家和佛教的学说，使道教一方面更加华化、汉化、士族化，一方面更加宗教化。自汉化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汉民族的“正统”，因而，吸收儒家的学说，有利于争取汉族人士尤其是士族。具体地说，寇谦之之所以吸引引进儒家学说，主要是为了使天师道更为中国化、汉族化，这样一方面可使其自身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使原有的粗糙不堪的民间宗教变得更为精致起来；另一方面可更为接

近广大民众，使它对上至重臣下至贩夫走卒都具有亲和力。同时，寇谦之也一定认识到，此前的所谓五斗米道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倒不如说是方术巫覡的近亲更适合，而外来的佛教才是宗教的正宗代表。为了使天师道更彻底宗教化，途径之一就是借鉴佛教的教义和教规。事实上，也正是在寇谦之做了这样的改头换面的革新后，天师道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更像地道的宗教了。

总之，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原始性减少了，成熟程度加强了，特别是在性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删除了违背封建礼度的成份，增添了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从而使它由一个民间宗教演变成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

五、如日中天

得到皇帝的恩宠，寇谦之的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等从嵩山上下来的那四十多名道士也到了京城后，就在京城之东南隅开始建筑“天师道场”。这座道场，重坛五层，其形制完全遵照寇谦之两部新经的规定而设计、修建。始光二年，寇谦之还建议修建一座大道坛庙。这座庙下面是三重台阶，四周装饰着栏杆。据记载说，整个道观的形制与明堂十分相像，庙中还辟有四有四个专室，室内设有神坐，座右陈列着玉磬。还立着嵩、华等诸岳庙碑。于是，北天师道有了规模宏大的正式宗教活动场所。

与此同时，道士们的生活待遇也有较大改善，皇家负责

供给一百二十名道士的衣食。道士们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每个月还设数千人规模的大型厨会，几千人在一起聚餐，这规模在当时也真是相当可观的了。

寇谦之受到皇帝的器重和礼遇，这影响到了整个天师道的发展。反过来，道教的兴盛和发达、壮大，自然又烘托和抬高了寇谦之个人的地位。不久，天师道就俨然是北魏的国教了，年近耳顺的寇谦之也终于实现了贵为“帝王师”的目的。更准确地说，此时的寇谦之是天师而兼国师，地位之显赫，一时无匹。从此，以皇帝为首的北魏王朝开始崇奉天师道，宣扬寇谦之所谓的新法，一时间，北天师道广泛流传，波及全国各地。

随着寇谦之声望和地位的提高，他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局限在宗教事务之内了，往往还要涉及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北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雄心勃勃的太武帝欲乘夏主赫连勃勃新死之机进击大夏国，召集公卿前来议事。当时大臣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太武帝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正像人们在遇到悬而不决的事情要求神问卜一样，太武帝想到了面前的“活神仙”寇谦之。于是，太武帝就向寇谦之请教，问他这次战事的结局如何，寇谦之满有把握地回答：“必克。”其实，寇谦之对于军事上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他的私下曾对崔浩讲过肺腑之言，自称“学不稽古，临事暗昧”，还让崔浩专门为他编写有关治国方略的著作。现在太武帝向他请教这样的军国大事，也实在可说是问道于盲了。值得注意的是，念念不忘道教事业的寇谦之抓住了这个机会，马上又说：“陛下，按着上天的意愿，您才是真正的应命

天子，而且这一天命现在正是到了应验的时期了，所以不迟不早，恰在这个时候上天降下《录图真经》。因此，陛下应当先以武力安定九州，之后再加以文治，这样就可以成就太平真君了。”原来，所谓谜一样的“太平真君”不过是预留给太武帝的一个封号罢了。北魏神䴥二年太武帝亲率大军攻打柔然，寇谦之亦随军参赞。战场上，当敌人溃散逃跑时，他执意劝说太武帝要穷追猛打。他的这一建议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因为出发之后他曾向崔浩请教过，他问：“这次出师，结果会如何？我军真的能够取胜吗？”可当得起军事家之称的崔浩满有把握地回答说：“根据天时、地利以及敌我双方的力量来判断，这场战争我军必胜无疑。”不仅这次战役寇谦之随军出行，他还参加过别的战役，比如太武帝出兵讨伐造反的盖吴时，寇谦之亦随军。

自公元426年起，魏太武帝亲率鲜卑轻骑连年出击，横扫中原，相次翦灭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终于在公元439年结束了西晋以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

勿庸赘言，统一战争的胜利，是魏初诸帝加强皇权、力行改革、经济与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与《录图真经》宣扬的所谓“符命”并不相干。但在战争进程中，由于崔浩和寇谦之两人随军出谋划策有功，故而统一大业完成后，太武帝也愈益崇信道教、宠敬寇谦之。寇谦之在北魏王朝中的地位真是显要之至，国家的许多大事以至军旅之事，都要商之于寇天师，至于对那些灾祥讖纬等神异之事的解释，那更是非寇谦之莫属了。比如北魏太延元年（435年），自三月

至六月整整一个春天滴雨不降，举国上下一片惊慌。面对如此天灾，无可奈何的太武帝下令让有关方面的官吏“遍请群神”，几天之后，果然普降甘霖。就在这一天，有一个妇人手持一方玉印到潞县侯孙家出售。孙家得到这方印，觉得十分奇怪，等事后再访求那位妇人时，竟毫无踪迹，莫知所在。那方玉印上面刻着样子十分奇怪少见的三个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说不明白，只有去请教天师了。寇天师说印上的字是“旱疫平”三个字，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做了一番解释说：“此神中三字印也。”又说这种见所未见的字体是所谓的“龙文纽书”。

道教空前兴旺和寇谦之十分得宠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贵为一国之尊的皇帝接受了道教符篆，成为道教队伍中的一员。皇舆亲降道坛，接受道教尊神的封赠，号曰天师，宣扬道式，声重当时。

随着地位的巩固，寇谦之继续按部就班地实施他的计划。公元440年，寇谦之主动提出要为太武帝到中岳嵩山去“祈福”。自然，寇谦之又是以他特有的“精诚”通感上天，太上老君冥授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之道号，还赐予冠带袍服。不久，寇天师回到宫中奏明皇帝，于是太武帝下诏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元年”。这件事情本身又足以显出寇天师及其新天师道在太武帝心目中，以及在整个王朝中的突出地位和非凡影响。至此，太武帝既是国君，又是太平真君；而寇谦之既是天师，也是国师。其实，应该说寇谦之早就号准了太武帝的脉：太武帝对“太平”（“太”也可作“泰”）二字情有独钟。他在泰常七年四月，受封泰平王；登基之后，戎马倥偬，

整日生活在刀光剑影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太平。他在授权太子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的诏书中就说：“我自继承了祖宗的伟大创举后，经常想着要扩大基业，传之万代，如今虽然在武功方面影响巨大，但文教方面却未能畅通，所以这不是崇尚太平之治的正确路子。”太平真君这个年号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多的年号了，字数达到4个，可说是有些累赘，想来使用起来也不甚方便，但它却是太武帝所用6个年号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其他分别是始光5年、神䴥4年、延和3年、太延6年、正平2年，只有太平真君这个年号足足用了12年之久。

本书开头说过，相传寇谦之的十三世祖是东汉重臣寇恂，而他的父亲是东莱太守，他的兄长则是雍州刺史。在极为注重出身、门第的南北朝时期，既有这样的老祖宗，又有那样的父兄，这对于寇谦之的事业无疑具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但反过来说，寇谦之又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使自己的家族一时煊赫无比，真可称是光宗耀祖了。史书记载，由于他的道术高明，受到了北魏世祖太武帝的“敬重”，不但自己得到了显赫的地位，而且他的父亲以至祖母也沾了不少的光。《魏书》记载，他的父亲被迫赠了“安西将军、秦州刺史、冯翊公”等一大串头衔，并赐命服，谥曰哀公。此外皇帝还下诏命秦雍二州为其在陵墓前立碑。寇谦之的祖母，即寇修之的母亲也被封为“冯翊夫人”，这可是难得的殊荣。此外，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多得到了名誉上的封赠甚或成为具有相当权力和地位的官宦。《魏书·寇赞传》中说，寇谦之家族中的本家兄弟、堂亲被迫赠为太守、县令，甚至得到

候、子、男等爵位的，竟多达 16 人，而握有实权从事具体行政工作的，有 7 位郡级官员、5 位县级官员。这可真有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了。

六、日薄西山

寇谦之及其新天师道最为鼎盛的标志应当是兴建所谓的“静轮天宫”。要知道，寇谦之的最终理想就是“出静轮天法”，因为据说到那时即可成真仙了。

太平真君三年，寇谦之地位日显、影响日重，他觉得时机成熟了，想起了自己的最终宗教追求，向太武帝提出了修建“静轮天宫”的要求，并建议太武帝亲临道坛，举行接受天命的仪式。太武帝果然同意了这一建议，亲至道坛，接受符箓。而且，为了遵从道教所崇尚的颜色，他的随行队伍的旗帜一律是黑色。据史书记载，这种仪式后来被保留下来，成为定式，以后的几位皇帝，也都照此做法。至此，寇谦之可称是尊显之至，新天师道也可谓是如日中天。

其实，所谓的“静轮天宫”实际就是一座高楼或高塔，按寇谦之的要求，一定高到听不到鸡鸣狗吠之声的程度，这样就可以与天神交接往来了。从北魏神䴥四年起，静轮天宫开始兴建。据酈道元在《水经注》中的描述，这座静轮天宫果然是巍巍无比，高耸入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这项巨大的工程，“工役万计”。尽管皇家投入很大的财力、人力，但几年过去了，工程还远远不能完成。话说回来，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寇谦之深信不疑，太子拓跋晃就是对寇谦之及

其静轮天宫表示怀疑的人之一。拓跋晃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向太武帝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凡人和上天本来就是两回事,尊卑高下之分早已定好。以寇谦之这样的做法根本无法达到目的,结果只能是耗费财力,劳弊百姓。如果一定要坚持的话,还不如建在东山之上,这样还可以减少许多工役。”太武帝对太子晃的这番话比较赞同,因为触到了他的心病。太武帝也不由得向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不过是因为崔浩赞成,所以不好不给他面子。而且,他还明确表态说,他也知道这事根本就不会有结果。原来,英武大略的太武帝并不是一时糊涂,他心里明白得很。可想,他对寇谦之的尊崇、对天师道的信奉大约也与此同出一辙,完全不过是一种出于政治目的的利用罢了。由于太武帝对崔浩、寇谦之的宠信,使太平真君年间新天师道在北魏发展到了极盛。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太武帝晚年对崔、寇二人宠信之深,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并非完全不知道道教的虚诞,只是为了借此笼络崔、寇二人为其效力,才不惜为之破费国帑民力。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及宗教领袖与政治首脑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古人云:暑极不能生暑而生寒,寒极不能生寒而生暑。从太武帝与太子晃的对话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崔浩、寇谦之以及新天师道的危机即将降临。

但是,从表面上看,新天师道的势力要比佛教大得多,寇谦之及其密友崔浩深得太武帝的宠信,在皇帝面前几乎是说一不二。与此相反,佛教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和壮大,反而遭到灭顶之灾,直至最后酿成震惊古今的所谓“灭佛”恶

性事件。

随着寇谦之和道教地位的提高,随着太武帝对道教的亲近和信奉以至加入,同时也伴随着佛教徒不法行为的屡屡暴露,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日益严厉起来,直至后来予以限制和约束。《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太武帝下诏,其中说道:“有的愚民缺乏判断能力,迷信妖邪之人、妖邪之说,家中私养巫师,挟藏讖记、阴阳、图纬、方伎之类的图书。同时,一些僧人又装神弄鬼,兴妖作怪。从今以后上自王公,下至庶人,凡家中私养僧尼、巫师及金银工巧之人的,一律要将这些人遣送到官府衙门,不得隐瞒。”还硬性规定:以今年二月十五日为最后期限,过期不出的,僧尼要处死,主人家满门抄斩。这实际上是对佛教在寺院以外活动的严格限制。因为诏书特别声明是禁止“私养”,不允许“在家”,而并未涉及寺庙中僧人的处理。当然,说成广义的“灭佛”亦无不可。

同年九月,又发生了处死凉州高僧释玄高的事件。据《高僧传·释玄高传》载,玄高和尚俗姓魏氏,本名灵育,是冯翊万年人,后来成为凉州高僧。公元439年北凉灭亡后,玄高又前往北魏国都平城传教,成为太子拓跋晃的师父。据说太子曾由于崔浩和寇谦之二人的谗言而受到太武帝的疑忌,幸亏玄高作“金光明斋七日懃忏”,使太武帝夜里做了一个怪梦:其祖父和父亲手执宝剑威严地对他斥责了一番。从梦中惊醒后,太武帝果然就不再猜疑太子了,反而让太子副理国政。此后崔浩、寇谦之又向太武帝进言,告诉他说:“您上一次所以做梦完全是玄高的妖术所致,应当铲除了这

个妖僧。”太武帝闻言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捉拿玄高。恰巧此时另一位来自凉州的高僧慧崇，也受到了太武帝的猜疑，于是就在这年的九月十五日将这两位僧人同时处死。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太武帝又下诏规定和尚死后不得葬于京城之内。

到了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关中地区暴发了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大起义。次年二月，太武帝亲率大军至长安讨伐盖吴。长安某寺僧人在寺中迎接皇帝及其侍从，随从官员在寺院的便室内发现了弓矢矛盾等兵器，急忙出来向太武帝奏闻。太武帝一听，勃然大怒，马上联想到了作乱的盖吴，当即表态道：“这些东西本不是僧人能用到的，这个寺院的僧人一定与叛乱分子盖吴有勾结！”下令将全寺僧人一齐处死。之后，在清点核查寺院财产时，又发现了大量的酿酒器具，至于州郡牧守及富人们在寺中所寄藏的财物更是多得惊人，竟是数以万计。此外，寺内还有为便于与达官贵人的女眷私行淫乱而设置的秘密窟室。这一系列的不法行为大大地激怒了太武帝，当时崔浩随军参赞，正在身边，趁势劝说太武帝，建议他当机立断，铲除佛门祸根。于是，太武帝下诏，命令诛杀长安城中所有僧尼，焚烧毁坏一切佛像。其后，事态进一步扩大，屠僧毁佛的范围并不局限在长安一地，还派人回京城下书，命令除平城外，全国其他地方均照长安的做法行事。

当时留守京城的执政者是身为监国的太子拓跋晃，此人素来敬佛，接到太武帝的诏书后并没有马上宣布执行，而是频频给太武帝上表，陈述刑杀沙门的弊端，并希望能保护

佛像和图书。然而太武帝决心已定，虽然太子晃一再请求，仍然得不到允许。无奈，拓跋晃最终向全国下达诏书，明令：自今以后，凡是胆敢信仰佛教以及塑造佛像的一概满门剿灭。同时勒令各级军政官员焚烧和毁灭所有佛像经书，所有的僧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并活埋。此时的准确时间是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这就是著名的“太武灭佛”的全部过程。

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贵为国师和天师的寇谦之在举国震惊的灭佛高潮中溘然仙逝。据说死前他曾对弟子们说：“如果我寇谦之不死，你们都能够有机会升迁上界，名列仙录。我死了之后，对你们而言，想升入天宫真是难之又难呀。”而且，他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预言。寇谦之离开人世的那天恰好是设会之日，他亲手在上师座位前布置了两块坐席。弟子对这一举动不大明白，追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寇谦之告诉他们：有上界仙官要降临了，这是我为他们准备的座位。这天，寇谦之还有一些奇怪的反常的举动，比如他忽然对弟子们说：“我感到呼吸困难，肚子也痛得厉害。”尽管这样，他仍是行止如常。当天晚上，这位贵为一国国师和一教天师的寇谦之便“羽化飞升”了。神仙就是神仙，寇谦之离开人世时的情形也与常人的逝去全然不同，据说他死的时候，从嘴里冒出了一股状若烟云的白气，这股气从窗户出去后，又一直升到半天之高才渐渐消失。与此同时，寇谦之的尸体也奇怪地变长了，弟子们找来尺子量了一量，竟然长达八尺三寸。三日之后，寇谦之的尸体又稍稍缩小了些。到装敛时好像更小了，弟子再拿尺子一量，竟然只剩六寸长了！弟子们这下信服了，师父真的不是凡人，这不

就是经书上所说的“尸解”吗？当然，史书上这些记载，不过是道教徒们故意编造的骗人的鬼话罢了，“长生不老”的梦想无法突破自然规律的限制，只好编个“羽化升飞”的鬼话来作了结。至于寇谦之的葬礼那完全是按着新天师道规定的礼制进行的，其隆重和排场可想而知。

从此以后，道教事业和弟子们的前途一如寇谦之所预言的那样，北天师道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到了北魏太和十五年秋天，孝文帝下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昔日京城之内的住户不多，房舍也稀少。但现如今人口稠密，居民住宅鳞次栉比，这样的话，就把天神和凡人猥凑混杂在一起，这种情形实在不利于崇敬至法，清敬神道。所以，道教的活动场所以移到郊外为适宜，可以在桑干河和北岳恒山之间，设置一处永久性的道教场所。同时供给下民五十户，以为供养斋祀之用，道观的名称仍叫为崇虚寺。至于神职人员可从各州郡召调隐士们来充任，人员定额以九十人为限。”其实，仅从这道诏书的内容也不难看出皇帝的态度及道教自身情形。所谓“人神猥凑”，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借口而已，实质上，皇帝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手段。将道教活动场所的位置指定在距离京城有百余里的崇山峻岭之中，皇帝的用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神职人员的定额以九十人为限，只要和道教最佳兴盛时供给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月设数千人厨会的规模相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专业的宗教神职人员需要从各州中去抽调，可想其信徒也绝不再会是当年蜂拥而至的情形了。

等到太和十五年迁都洛阳后，道教基本上是沿袭当年

的规模、格局。道坛仍设在都城南郊，占地方圆二百步左右。宗教活动再没有当年那么频繁，一年之中，主要活动就是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三次，参加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包括坛主、道士等在内，也不过一百六十人左右。据史学家魏收记载，其时一般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言。等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时，朝廷中有关部门的大臣上表奏请取消道教。至此，当年煊赫一时、炙手可热的道教开始走向衰落。到了把持东魏实权的鲜卑军阀高澄准备夺取拓跋氏天下时，首先罢除了天师道，不再承认其为官方宗教。至北齐天保六年（555年），道教又在与佛教的论争中惨遭失败，齐文宣帝高洋下诏废道，还勒令道士剃发为僧。有一些道士不服从这一命令，其中四人被正法，于是齐国境内从此竟没有一名道士。至此，寇谦之创立的新天师道团，大概便几乎散亡殆尽了。

七、历史地位

上面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寇谦之无论如何是一位在北魏史和中国道教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寇谦之及其所创立的北天师道不但对北魏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北魏以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寇谦之对中国的思想史、宗教史产生的巨大影响。表现为：寇谦之一方面打破了佛道对立的僵局，化干戈为玉帛，学习和借鉴佛教的教义、教理来充实道教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又填平了入世与出世的鸿沟，消弥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隔阂；援儒入道，用久已深入人心而且体系完备的儒学理论改造和补充道教体系。这样，无意之中，寇谦之就做了开启“三教合一”先河的鼻祖。

“三教合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吸收佛教的教义、教理。在介绍寇谦之吸收佛教教义、教理方面的情况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个历史性的误会，那就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及佛教徒都认为寇谦之是佛教的死敌，而且还是历史上血腥的“太武灭佛”事件的主谋。其实，这些人都只是出于一种简单的直观的推测，而没有确凿的证据和扎实的考证。事实上，“太武灭佛”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佛教势力威胁到了统治者的皇权，而不是什么“佛道之争”；灭佛的主谋是崔浩，而不是寇谦之。

事实上，身为道教领袖的寇谦之并不赞成以残忍的毁灭性的手段消灭佛教。考察他的一生，我们发现了他曾屡次劝阻太武帝屠杀僧人的记载，而并无相反的举动。比如在攻克凉州后太武帝要杀戮抵抗北魏军队的三千“登城僧”时，寇谦之以天降异象为由，劝阻了太武帝的一次残酷杀戮。甚至当崔浩鼓动灭佛时，随驾出征的寇谦之也曾“苦与诤争”，以至他对崔浩大动肝火，以死相咒：“您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会折寿损命的，最终会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另外，更有人说寇谦之是礼敬佛教的。至于寇谦之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以为原因不止一端：其一，晋惠帝时，天师道祭酒王浮与沙门惠远论争二教邪正时，王浮曾根据老子入夷狄而为浮屠的传说，杜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说佛教的

教主释迦牟尼也是道教始祖老子度化的一个弟子。寇氏或许发自内心相信“老子化胡”之说，认定佛出于道，佛为道之一支，二者不应同室操戈。其二，寇谦之向佛教学习和借鉴了许多东西，可以说，他是一位佛教的私淑弟子。其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佛道同为宗教门派，互相残害，于心不忍。其四，寇氏愿意与佛教“和平共处”，正当竞争，而反对以武力解决信仰问题。

另外，寇谦之对佛教教义的借鉴和模仿是有目共睹的。寇谦之的伪经《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既是寇谦之证明身份的一份假“委任状”，更是他整顿天师道的基本纲领，因而，其中主要内容是具有约束和规范道教信徒行为方式及宗教活动的仪轨戒律。而在此前，天师道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戒律的。我们说严格的规范的宗教意义上的道教“戒律”自寇谦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始，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而这部“戒经”对佛教戒律的模仿痕迹十分明显。

总之，寇谦之清理整顿旧道教，创立新的北天师道的手段之一就是吸收佛家的理论和学说，使他的教门从理论到实践更符合广大汉族人士的观念和要求。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高明的，也是成功的，它既改变了旧道教混乱无序的局面，挽回了旧道教恶劣的名声，同时又赢得了包括崔浩在内的广大汉族士人的信任，为北天师道登上国教的宝座，为他本人赢得国师的地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寇谦之吸收引进佛家学说是成功的。

“三教合一”的第二个方面是吸收儒学的理论和学说。其实，说起来，道教与儒家发生关系并不自寇谦之始，早期

道教，除了张角等农民起义领袖所利用的民间道教组织外，其他所有上层道教，都不是作为儒教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儒学的辅翼者出现于世的，儒学是它们借以吸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来源。早期道教神学都把维护礼教作为头等教戒，如《太平经》强调为道要忠君、孝亲、敬长，《老子想尔注》也肯定忠孝仁义。著名的道教领袖葛洪指出，求仙要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而寇谦之所创建的新天师道专以礼度为首。在这方面，道教与儒家经学几乎没有差别。所以，后来的道教大都采取忠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立场，其道德信条中有大量规范与儒家道德完全一致。

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大量吸收了儒家的学说、思想，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魏收的《魏书》中，关于寇谦之及其北天师道有这样的记载：北魏神瑞二年十月乙卯，道教祖师太上老君下凡，召见寇谦之。他在封寇谦之以天师之位、授寇谦之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之经后，又亲口解释说：“我的这一套经诫……要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同书又记载，泰常八年十月戊戌，太上老君之孙、牧土上师李谱文又光降寇谦之修道所在的嵩岳，对寇谦之做了新的指示，授予新的经典。魏收认为这部经的内容大致与世间的礼法相去不远，要求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这两段史料中所谓的“礼度”、“世礼”都指的是儒家学说无疑。正如“仁”是儒家的终极理想一样，“礼”是儒家的全部行为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太上老君所赐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和李谱文所赐的《录图真经》，都不过是寇谦之苦心经营的两部伪经罢了。关于后

者,除了《释老志》的介绍外,我们所知甚少;关于前者,可知主要内容亦不过是道教信徒的行为规范,因为就当时形势而言,寇谦之要想使几乎是声名狼藉的天师道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直到取得皇帝及全社会的认可,首要的和必须的任务是加强道教信徒的行为规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借鉴佛教戒律的同时,又取法儒家学说。于是,前者保证他的“经”确实更像佛教“律”性质的“经”,后者又保证他的“经”更中国化、本土化,这样才能使人们接受起来更为亲切、容易。

另外,《魏书》之《崔浩传》中关于寇谦之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寇谦之在请求崔浩为他撰列“王者治典”时说:上天神祇指示他在人间传道的主要任务是“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这里所谓的“兼修儒教”,说的也正是吸收容纳儒家的理论、学说。

再次,说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吸收儒家的学问、思想,还有现存道教经典可为证据。事隔 15 个世纪之后,关于李谱文所赐的《录图真经》的内容我们所知的几乎就是《魏书·释老志》中介绍的那一丁点儿,而所谓太上老君所赐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却有幸在《道藏》中保存了一小部分残篇断章。据哲学家汤用彤先生考证,现存正统《道藏》力字号中七种残经为寇谦之当年伪造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篇章。这七部经分别是:《太上老君诫经》、《老君音诵戒经》、《太上老君律》、《太上经戒》、《三洞法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青鬼律》。仔细阅读这七部残经,确实可以找到许多来自儒家的思想、观点。如关于忠孝思想的,

要求信徒“相化以臣忠子孝、夫信妻贞、兄敬弟顺”。这十二字简直是对儒家经典的照搬，其内容概括了除朋友以外的五伦的全部要义。除此而外，还有其它的爱国尊贤等言论。经中所谓的“君亲忠孝”就是儒家“忠君孝亲”，经中所谓的“四方归仁”和“各念仁心”也完全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化，经中所谓的“系国承家”与儒家“修身齐家持国平天下”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又如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也与儒家同出一辙。其第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戒，不正是《礼记·曲礼上》“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照搬吗？其实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思想的继承和因袭。与此相仿的便是人家问讳。“崇贤重圣”更是儒家所一贯提倡和力行的。《太上经戒·十戒》中的第七戒的思想不过是儒家“大同”世界的现实表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正是“不得欺凌孤贫”吗？而“道不拾遗，夜不避户”不过是比不“夺人财物”更高的要求罢了。敬老、尊师、怜贫、轻财，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儒家的行为规范。《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现存诸残经中多有与儒家学说完全一致，或者进一步说是显然取自儒家的观点。有的经句中还直接了当地出现了“儒”字以及“仁”字。不仅如此，寇谦之还把道教的“中和”思想和儒家的“中和（中庸）”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他上述思想的理论根据。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除了儒家思想外，寇谦之还吸收了一些玄学思想。这种情形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寇谦之的新道教实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其形式虽为

道教的形式,但其内容多为儒家的礼,以及佛教的戒律和当时流行的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玄学理论。其实,寇谦之在吸收儒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玄学的内容,这个事实并不难理解。首先,玄学是魏晋南北朝的显学,是一种时尚,寇谦之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受到这种学术思潮的影响。其次,所谓玄学不过是《易》与老庄的结合,《易》为五经之首,本属儒家,其为寇谦之所亲近理所当然,而老庄本来便是道教的当行本家,尤其是其中的“老”,历来道教多奉之为始祖,寇谦之本人编撰的经书中亦多有假老君之名者,因而,他吸收玄学思想势在必然。

寇谦之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又一个贡献是:他提供了一个研究政治与宗教、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相互关系的一个典型范例。